



朱诚如
主编

清朝通史

乾隆朝
分卷
上

周远廉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主 编
朱诚如

清朝通史

舒
功
题
上



乾隆朝 分卷

主 编
周远廉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200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通史·乾隆朝/朱诚如主编, 周远廉分卷主编.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047-383-X

I. 清… II. ①朱…②周… III. 中国-古代史-
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336 号

清 朝 通 史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020 千字 印张 44.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047-383-X/K·180

定价: 110.00 元 (上下)

总 前 言

历时 4 个寒暑，由全国数十位清史专家学者辛勤撰写的《清朝通史》12 卷 14 册即将付梓，作为全书的总主编，谨赘数语，以为前言。

自清末迄今，近代的清史研究已经走过 90 多年的风雨历程。经过几代清史学者的辛勤耕耘，清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术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传统史学、实证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被抛弃，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史学界全面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清史研究随之进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学者们高度重视从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的角度考察清代历史，学术界关于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清代阶级关系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史研究的面貌，使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认识，从历史的表象进入到深层，从上层建筑深入到经济基础。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但扩大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而且加强了清史研究的科学性。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既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清史研究取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思想在解放，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扩

大，研究水平在提高，清史研究逐渐形成充满朝气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断代史著作的大量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郑天挺《清史简述》、鄂世鏞《清史简编》上编、戴逸主编《简明清史》、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戴逸和李文海主编《清通鉴》、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等。这些著作尽管风格不一，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学风严谨、勇于创新是其共同特点。此外，一些中国通史的清史部分，资料翔实，结构完整，也可以说是高水平的清史断代史著作。如蔡美彪主持撰写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史稿》第7册，等等。上述这些断代清史著作都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从综合性的角度，全面把握清史发展的脉络，探寻治乱盛衰的根源，反映了当代清史研究的水平^①。

我们这部《清朝通史》，基本上借助于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采用专题的形式，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于清代自兴起到灭亡300余年历史中所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军政大事，逐一进行比较翔实的述论，既考订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有专家学者的点睛之评，目的在于以这批学者积年所得撰写的这部著作，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从中受到启迪，并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清代历史，如果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代明而立，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朝被推翻，前后有268年；如果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算起，前后有328年；即使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元称汗算起，前后也有295年的时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清朝

^① 参见高翔：《五十年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

经历了孕育、发展壮大、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历史也经历了由古代到近代、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为了充分展示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揭示其经验教训，本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写起，直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

作为《清朝通史》附录的《清史图典》12册已经先行付梓。《清史图典》收录了近5 000幅与清朝历史相关的图像，其中有1/3是第一次见诸出版物。这些图像，或藏之于皇宫，或散失在民间，或流落于海外，我们尽力予以搜集和筛选，意在通过文字和图像相结合，使读者对清朝历史有一个感性认识，加深对清朝历史的理解。

全书由朱诚如教授任总主编，并负责总体设计、规范体例、撰写总序、全书终审。各分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具体分工如下：第一卷主编朱诚如教授；第二、第三卷主编阎崇年研究员；第四卷主编李治亭研究员；第五卷主编王思治教授；第六卷主编为冯尔康教授；第七卷主编周远廉研究员；第八卷主编张玉芬教授；第九卷主编喻大华教授；第十卷主编马东玉教授；第十一卷主编余同元教授；第十二卷《大事记》主编孟宪刚教授。对于参与全书撰写工作的各分卷主编和其他学者的通力合作深致谢意。

为便于读者核对资料，本书的注释采用篇目和页码相结合的方式，每卷在首次使用某种史料时均注明版本，如“《清史稿》卷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四，第833页，中华书局，1986年”等。

本书中的数字表述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方式，但也有某些篇目为庄重计保留了汉字表述方式。谨做此说明。

由于清史时间跨度较长、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又头绪繁多，真正动手写作的时候颇觉踌躇，好在及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学术单位众多学界前辈和师友的支持和鼓励，从而使我们有信心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同时，由于该书体例目前还只是一种尝试，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希望得到诸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文化部、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著名学者启功先生为本书和图典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朱诚如

2002年10月于北京

导 言

雍正十三年（1735 年）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胤禛去世，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即位为君，改明年号为乾隆。乾隆六十年（1795 年）九月，弘历下诏，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 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弘历传位于皇太子，自尊太上皇帝，“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仍由自己主持。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弘历逝世，享年 89 岁，嘉庆帝开始亲政。

乾隆年间清朝的基本形势，可以用“全盛之世，盛极渐衰”这 8 个字来概括。“全盛之世”，是清朝的顶峰，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但也正因为其是顶峰，便难以长期维持，从而在乾隆晚年转入盛极渐衰了。

（一）

乾隆年间（1736 年～1795 年），清朝的内外形势是有喜有忧，尤其是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不利的因素远远大于有利的条件。这个阶段及其前后的一些年岁里，英国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欧洲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法国启蒙运动兴

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美国独立，以英国商人为主的西方商人力图打破清朝一口通商的闭关政策，扩大商品输出，攫取巨大利润，俄国沙皇政府则千方百计蚕食中国领土。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严重威胁。

俄国沙皇政府从17世纪30年代起，就不断派遣殖民军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领土。顺治十年（1653年），俄国雅库茨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命契金奇等五人带去致顺治皇帝福临的信，要求清帝归顺沙皇说：沙皇“是许多皇帝和诸侯的统治者”，“他以圣谕命令你沙姆沙汗率领你的全族和所有的达斡尔酋长们接受国君的统治，终身为他的奴隶”，否则要用“战争来惩治你，夺取你的城市”。顺治帝遣派军队，打败沙俄殖民军，把侵略军全部逐出黑龙江中下游流域。

沙俄政府又对漠西厄鲁特蒙古进行诱骗和威胁，侵占土地，遭到了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及其继承人僧格的反击和遏制。僧格被人杀害。其弟噶尔丹几经征战，成为厄鲁特蒙古四部总汗后，改变了其父其兄反对俄国侵略的正义立场，与沙俄政府勾结。康熙皇帝三次亲征，逼得噶尔丹兵败逃窜，暴病而死。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艰苦奋斗，统一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荣任四部总汗，继续其父其祖抗击俄国侵略的方针。策妄阿拉布坦派多谋善断的堂兄弟大策凌敦多布率军攻打侵占了准噶尔部土地的俄国殖民军，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大败聚集在亚梅什湖的1万俄军，逼其损失3000人后狼狈撤退。

尽管沙俄政府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八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但它的殖民军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黑龙江流域及准噶尔部土地的侵占，不断威胁利诱厄鲁特蒙古各部酋长，要求他们臣服沙皇。乾隆二十一年、二十二年（1756年～1757年），原亲王、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叛清作乱时，与沙俄官员互相勾

结。沙俄政府企图利用阿睦尔撒纳来分裂、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其西伯利亚总督、奥伦省长等官员一再致书阿睦尔撒纳，劝其“归属我俄罗斯国”，保证其人身安全，妥善安置其部属。当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二年八月被清军追击，无处藏身时，逃入俄境，被俄国西伯利亚总督予以优待和保护。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北方和西北边疆的辽阔地区始终是虎视眈眈，随时要伺机出兵，大举侵占，形势堪忧。但是，由于沙俄政府相当长时间以来，主要忙于在欧洲的扩展，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上百年里，俄国先后与瑞典、土耳其进行了几次大的战争，又三次参与瓜分波兰，腾不出更多的精力、财力、兵力和时间，因此，在乾隆年间它不能派遣大军，公开向清政府宣战，大肆侵占黑龙江流域，也不能遣军大规模地、公开地占领厄鲁特蒙古地区，更不能出兵阻挡清军对厄鲁特四部的征战。这也算是为清政府统一准噶尔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局面也不容乐观。与中国云南省邻界的缅甸，王室后裔木梳城首领赛藉牙机智英勇，征战八年，打败得楞王的入侵，平定了多年的内乱，统一了缅甸各部，建立了阿隆耶王朝，国力强大。其次子懵驳继承王位后，又继续加强军力，不断进攻清政府封授的木邦、耿马、孟定等土司。中缅边界又未划定，缅甸国的持续进攻，使原来归属了清政府的许多土司地区，有可能被缅甸吞并。中缅交战，在所难免。

在西藏，英国政府通过东印度公司和直接管理，在 18 世纪控制了印度的许多地区，到 19 世纪中期，竟完全吞并了印度。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府必然会对邻境西藏怀有野心，中英之间的大规模争斗即将来临。

西藏的西南是廓尔喀，其疆土与西藏犬牙相错。廓尔喀原本是尼泊尔的许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乾隆中期，廓尔喀国王博赤

纳喇乘尼泊尔内讧，率兵征服各部，迁都加德满都，建立了新的王朝，军威日盛，构成了对西藏的强大威胁，清与廓尔喀迟早将要发生恶战。

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商人迫切希望扩大中外贸易，要求取消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乾隆二十四年英国商人洪仁辉赴天津控告粤海关勒索洋商，要求在浙江宁波开埠，虽被官方拒绝，但英国政府一再组团，前往中国，商谈扩大贸易等事，给清政府出了一道不易应付的重大难题。

与此同时，准噶尔部的崛起，给清政府带来很多麻烦。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帝入主中原以来，在康熙、雍正年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99年里，清政府必须经常考虑和防备的一个最大的强部，就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首的准噶尔部。明末清初，准噶尔部首领和多和沁被达赖喇嘛授予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的称号，一般称为巴图尔珲台吉。他率部几经征战，又打退了沙俄殖民军，势力强大，成为厄鲁特蒙古四部的总汗，辖有北及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中游，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天山北路的广大地区。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其长子僧格继承汗位。康熙九年（1670年），僧格被其同父异母之弟车臣和卓特巴巴图杀害，僧格的亲兄弟噶尔丹率军打败车臣等政敌，即位为汗。噶尔丹连续出征，屡败敌部，相继完成了对厄鲁特四部的统治和对“回部”、哈密、吐鲁番及其他部族的兼并，又借达赖喇嘛之名，自称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势力越大，野心也就越大，竟企图入侵青海，吞并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于康熙二十七年，率军3万进攻，连战连胜，占据了喀尔喀蒙古广阔地区，迫使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离家逃走，投顺清政府。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于乌尔会河一带击败清礼部尚书阿喇尼率领的6000余名军队，进一步向内地深入，直抵乌兰布通，距北京只有350公

里，严重威胁了清朝安全，京师为之戒严。康熙皇帝为了确保西北和北部地区安全，使喀尔喀蒙古三部能够重返故乡，三次统军亲征朔漠，大败准军，噶尔丹败病交加死去，喀尔喀三部经清帝编立盟旗，返回旧地。

僧格之子、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乘噶尔丹败亡，迅速扩展实力，成为准噶尔汗和厄鲁特蒙古四部总汗后，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遣军远征西藏，第二年十月攻占拉萨，康熙帝遣军入藏，于五十九年大败准噶尔兵，将其逐出西藏。

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后，其子噶尔丹策零即位为汗，于雍正九年（1731年）大败清军于和通泊，清副将军、辅国公巴赛，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参赞大臣、一等公、前锋统领达福等一大批大臣死亡。如果不是清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和硕亲王、固伦额驸、大扎萨克、赛音诺颜部盟长策凌率军拼死反击，大败准噶尔军，清军是抵挡不了噶尔丹策零军队进攻的。这样一来，准军就要不断进掠喀尔喀蒙古，甚至深入内地，西北、北方就不得安宁，西藏、青海、甘肃也要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准部的强大，准噶尔汗对喀尔喀蒙古，对西藏、青海的虎视眈眈，不仅直接威胁了清政府西北、北方地区的安宁，而且也使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为了防御准军的入侵，清政府派了两路大军长驻西北，10余万兵士和随同士卒的10余万役夫，要消耗大量银米器物。几次大的征战，军费开支巨大。康熙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库存银到康熙五十年达到5 000余万两，国库充盈，可是经过对策妄阿拉布坦的防御及用兵，到康熙六十一年只剩下800万两。雍正中户部库存银6 000余万两，自雍正七年用兵准部以后，“动支大半”，到雍正十三年，军费开支总计多达5 000~6 000千万两，平均每年800万两，除去用每年收入之

中的部分银两支付外，也动用了国库，以致到雍正十三年，国库只剩下白银2 400万两^①。

这就是为什么准噶尔部成为清政府的严重威胁，以致康熙帝、雍正帝均曾“屡集廷议，皆有‘此贼不灭，天下不安’之论”。准部已使清之“我祖二宗，三朝（康、雍、乾）四顾，肝食仄席，戍塞防秋，中国耗弊”^②。因此，乾隆帝弘历一即位，就把与准部议和息兵守边列为“第一要务”，屡派使者，与噶尔丹策零谈判，历时五年余，终于达成和议，划定了边界，双方皆利。

然而，清政府仍然心有余悸，仍把准噶尔部视为强部大患，不知何时又起烽烟。使它感到幸运的是，横行西北近百年的准噶尔部，终于盛极而衰，内乱迭起。噶尔丹策零于乾隆十年（1745年）病故，其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继承汗位，凶暴淫乱，遭姐夫赛音伯勒克等台吉拿获废黜，拥其同父异母的长兄喇嘛达尔扎为汗。乾隆十八年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起兵，捕获喇嘛达尔扎，自立为汗，并一再发兵攻打不附于己的汗、台吉、宰桑，厄鲁特蒙古四部的大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等，大宰桑萨喇尔等，从乾隆十五年起先后率领部众数万人归顺清帝，愿意率部从征，讨伐达瓦齐。准噶尔部的内乱，为清政府的出征，消灭西北、北方最大威胁的强部准噶尔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最好时机。

国内的财经、政治条件这时也比较好。比如，领土极为辽阔，外蒙、内蒙、青海、西藏等边区皆隶于大皇帝。人口众多，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第9页，关外本，以下均同；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土地开辟，百业发展，赋税收入增加。雍正年间，岁征田赋银3 000万两左右、赋米400余万石、盐课银400余万两，乾隆年间，收入更增加了很多。国库存银数量巨大，康熙中叶以后库银基本上是在4 000万两左右，雍正年间，每年平均库银有4 000万两，其中雍正七年、八年皆为6 000余万两。这样长时期的国库充盈，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罕见的。虽因用兵准部，军费浩繁，但雍正十三年国库仍有白银2 400万两。从第二年乾隆元年起，到十九年，除八年、十三年、十四年存银为2 700~2 800万两以外，其余年份每年国库存银都超过了3 000万两，此后库银继续增加，乾隆三十年以后，基本上每年库银都高达6 000~7 000万两。

当然，不利的因素也有，问题不少。一是“生齿日繁”，“民用难充”，乾隆六年在册人口已有14 300余万，二十七年突破两亿大关，而且随着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加剧，大量自耕农丧失了土地，许许多多民人衣食艰难，多数旗人生计困窘，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盛行。二是满洲丁少，汉人众多，悬殊太大。清帝制定了“八旗根本”、“八旗甲兵”乃“国家根本”的基本国策，八旗军尤其是满洲八旗军是清政府的主要统治支柱，但满洲人丁太少了。雍正元年，满洲八旗男丁才有154 329丁，而全国在册男丁却是2 570余万丁，以汉族为主的男丁超过满洲男丁160余倍。要想以15万满洲男丁来统治全国1 700余府厅州县以汉民为主的两三亿兵民，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三是将庸兵弱，军威不振。雍正末年，八旗军约有20万人，绿营军有兵67万名。早年八旗军曾经所向无敌，绿营兵亦屡立战功，但好景不长，承平日久，将领懈怠享乐，怯于征战，士卒疲弱厌战，动辄溃逃。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战，以满洲、蒙古兵为主的北路大军1万人，主帅傅尔丹丢盔弃甲易服逃窜，十几位副将军、

参赞大臣、都统、前锋统领、副都统阵亡，7 000余名将士死亡和失踪。乾隆十二年开始的一征金川，调兵6万，三易统帅，进攻不满万人的金川藏民，用银1 100余万两，历时两年多，相继斩了大学士、经略讷亲、大学士、川陕总督庆复及张广泗三位统帅，可是，寸土未得，战辄溃败，往往是两三千官兵败于金川藏民数十人之下，气得乾隆皇帝连说“殊为骇听”，“实出情理之外”。这样的庸帅怯将、疲弱士卒，怎能迎战强敌，开疆拓地，固边保民。

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短处同在。是进是退，还是原地踏步，这就看主观能动性如何了。这就是摆在新君及其辅佐大臣面前的基本形势。

(二)

人们常常提到“康乾盛世”，也有人怀疑是否曾出现过“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的中国，真的出现过“盛世”吗？这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应该阐述清楚。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乾隆年间是否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

对此，乾隆皇帝弘历提出了自己的评断，认为此时确实是大清国全盛之时。他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讲述应该征剿金川时说：“在国家全盛之时”，理应一劳永逸，根本解决问题^①。乾隆十五年七月，他批驳御史罗源浩请清查税课以增多国帑用以赈灾的奏折说：“当此国家全盛之时，仓有余粟，库有余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三，第3页。

帑”，何需苛察细碎，“累及商旅”^①。此后，他多次讲到“我朝当全盛之时”，“国家全盛之力”，“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我清国全盛之势，何事不可为”，“我大清正当全盛之时”。直到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他在讲述不需再次进攻安南的原因时，仍说，“方今国家全盛”，若厚集兵力，自能破敌，攻取都城。同年三月，他又下谕说道：“方今国家全盛”，准噶尔、金川等处俱已平定，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取安南^②。“全盛之时”，“全盛之力”，“全盛之势”，虽有一字之异，但根本意思是清楚的，这就是乾隆帝认为，乾隆年间的清朝，是“盛世”，是“全盛之世”。

乾隆年间，是否出现了乾隆帝弘历所说的“大清全盛之世”？这个“盛世”的形成是由于哪些条件？“全盛之世”的基本面貌如何？这几个问题必须解答，也能够讲述清楚。先看看形成“盛世”的主要因素。

一般说来，康熙、雍正两朝在文治武功两个方面取得的成就，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乾隆年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士农工商兵各尽其力，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压迫、抗击外来入侵、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更是促进“盛世”形成的强大动力，这里不必多说。现在要着重探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具体说来，以乾隆帝弘历为首为主的清朝中央政府，究竟是怎样做的？心态如何？表现怎样？采取了哪些重要政策和措施？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弘历即位之时，25岁，距顺治元年（1644年）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已有92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守成之君年岁的帝君。满汉文武大臣是守成时期的官员。此时，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九，第5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一，第27页；卷一三二三，第29页。

摆在乾隆帝和清政府的重要大臣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他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历代绝大多数守成年岁的君主所走之路，坐享其成，墨守祖规，得过且过，既不荒淫无道，暴虐残酷，又不讲求进取，胸无大志，苟且因循，安享其乐，当一个平庸之君。军国重臣，文武高官，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惟知保官升官，逢迎皇上，敷衍政事，只要不出大的乱子就谢天谢地，缺乏进取之心，没有改革之气魄。第二条路是昏君之路、奸臣之路。隋炀帝杨广即位之时，农业发达，人口增加，国力强大，库藏充盈。这个昏君不思继承父志，却大兴土木，巡游四方，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害得百姓死亡流离，田畴荒芜，在位仅仅14年多即被杀亡国。第三条路是守成兼创业之路，如汉武帝和唐玄宗，都曾有所作为，但也很艰苦，走这条路的君王也很少。乾隆年间，从帝君来说，弘历并非子以母贵，并非中宫皇后之嫡子，会轻而易举的必然即位。弘历之所以能受到父皇的宠爱，特别是能受到皇祖康熙帝的宠爱，带入皇宫教养培育，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在百余皇孙中脱颖而出，博得了皇祖和父皇的欢心与宠信，得以登上宝座，君临天下。这样一位从小就靠自己本事脱颖而出的英俊君主，当然要继承祖先勇于进取的优良传统，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宏伟事业。有了这样的帝君，就能任用贤能大臣，共同把康熙帝、雍正帝及其亲信大臣开创的“盛业”之基不断推进和发展，创建“康乾盛世”的乾隆“全盛之世”。

乾隆帝弘历主要在三个方面做了许多事情。首先是“固本恤民”。他登基不久，就下达了一道类似施政纲领的重要谕旨，强调要勤理国政，“爱养百姓”，革弊兴利，以图达到民有“恒产恒心”，而“民生优裕”，则“民质自驯”，自然就可以“本固邦宁”